

戈巴契夫的政治體制改革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戈巴契夫 (M. S. Gorbachev) 五十四歲登上蘇共總書記寶座，即以明快、大膽的作風推行「改革」(Perestroika, restructuring)。一九八六年二、三月的蘇共第廿七次大會以來，更逐漸強調「改造」。如今「改造」旋風，正逐漸席捲蘇聯、震撼東歐，也引起世人的注目。

戈巴契夫是怎樣上臺的？他的「改造」會成功嗎？這實在不可能有明確的答案。本文只想從現有資料中，搜尋出一些可供參考的蛛絲馬跡，如此而已。

壹

先談戈巴契夫其人其事。

戈巴契夫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出生在俄羅斯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克拉斯諾格瓦爾迭伊斯科的農家。一九四六年開始他的勞動工作，同年起在斯塔夫羅波爾邊區，擔任拖拉機站聯合收割機助理機手。

他有很好的學歷，一九五五年畢業於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法律系。一九六七年又在斯塔夫羅波爾農業學院函授部畢業。因此在法學士外又多了一個農業專家頭銜。

但戈巴契夫仍然是靠黨團工作起家，才爬到今天的高位。他於一九五二年加入蘇聯共產黨，一九五五年開始在斯塔夫羅波爾市及邊區擔任共青團及黨務工作。一九六二至六三年任蘇共中央派駐斯塔夫羅波爾邊區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地區生產管理局的黨組長。或許是由於接近農業工作，他才在斯塔夫羅波爾農業學院函授部進修，又因為這項經歷與學歷，使他日後進入蘇共中央書記處，就首先主管農業而成爲農業專家。他在斯塔夫羅波爾邊區的黨務工作由底層爬到塔頂，於一九七〇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

十一月任該邊區黨委會第一書記。不過，他也很早就進入中央。

一九七〇年戈巴契夫當選第八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七一年蘇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一九七四至七九年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任蘇共中央書記，繼庫拉科夫（F. D. Kulakov）之後主管農業。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蘇共中央全會時，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八〇年十月蘇共中央全會時，又升任為政治局正式委員，並一直兼任中央書記。

戈巴契夫在中央書記處，先後主持過農業、輕工業及思想理論工作。他在布里茲涅夫（L. I. Brejnev）時代，業已嶄露頭角。安德羅波夫（Yu. V. Andropov）任內，他很受器重。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時，他已儼然是第二書記。他如此春風得意，一是他個人精明能幹，二是蘇斯洛夫（M. A. Suslov）的賞識與提拔。蘇斯洛夫是蘇共理論界的元老，一九四七年進入中央書記處，一九五五年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即現今之政治局委員），在他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五日去世之前，一直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主持思想理論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工作，是左右布里茲涅夫政策的重要人物。蘇斯洛夫曾於一九三七年起任羅斯托夫省委會書記及奧爾宋尼基則邊區（即現今之斯塔夫羅波爾）黨委會第一書記，其時戈巴契夫尚屬年幼，然蘇斯洛夫對該邊區黨務頗為關心。嗣後，庫拉科夫於一九六〇年任斯塔夫羅波爾邊區黨委會第一書記，其時戈巴契夫已漸露頭角。一九七八年戈巴契夫任中央書記，繼庫拉科夫主管農業後，即為蘇斯洛夫所賞識而多所提携。蘇斯洛夫以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主持思想理論工作，並兼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蘇氏死後由契爾年科繼任其上項職務。契爾年科出任總書記後，上項職務由戈巴契夫繼任。

安德羅波夫於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死亡，契爾年科於十三日的蘇共中央特別全會上當選總書記。該次全會由年輕的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戈巴契夫作結語。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契爾年科死亡，戈巴契夫於當天召開的中央全會上當選總書記，其速度之快，為前所未見。戈巴契夫當選後，打破慣例取消新任總書記的慶祝會，囑咐與會者各回自己崗位照常工作。

貳

農業是共黨國家之癌，布里茲涅夫政權已致力增加農業投資，初期雖抑制農業副業的私人經營，後期則反而加以鼓勵。蘇聯的宅旁園地（即中共所謂自留地），過去只適用於農民，一九七七年蘇聯新憲法（布里茲涅夫憲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

「公民可利用按既定法律程序所授予之小塊土地，為經營副業（包括飼養家畜與家禽）、種植蔬菜與水果，以及建造個人住宅之用。公民應合理利用所授予之土地，國家與集體農莊協助公民經營副業。」

「公民」就不以農村及農民為限，而國家和集體農莊還要協助公民經營副業，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一九七八年戈巴契夫任中央書記主管農業後，八十年代初，蘇聯就成立蔬菜水果部，綜合管理蔬果從栽培、保存、加工到流通等事宜，減少過去的無謂損耗，實際也是幫助農民經營副業。到一九八三年春即安德羅波夫政權時代，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實行集體承包制。農民十人以上可組成生產隊，少於十人的可組成班，與國營農場、集體農莊負責人就年間生產量、徵購條件訂定個別契約，承包者對契約中的土地、農業機械、肥料等可自由使用，生產量超出契約部分歸農民所有。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戈巴契夫以總書記身分向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演說中，聲稱儘快將放租土地（應即前述之承包）的成功實驗，推廣到個人及家庭耕作隊，是極為重要的。他說，這一結果將使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他暗示這將是緩和蘇聯缺糧的快速方法。^①

蘇聯經濟成長率從一九五〇年代起，即已呈現降低的端倪。因而有五〇年代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的改革，和六〇年代柯錫金(N. A. Kosygin)的改革。布里茲涅夫晚期，雖也有上述農業方面的改革，但基本上他是保守的。依照大陸學者鄭彪的看法，他認為綜觀近三十年的蘇聯經濟改革，從總體上看是不成功的。因為不改變原有的經濟體制，從而也避免引起政治體制和上層建築的相應改革，那只是不「傷筋動骨」的「修補」，無法解決問題。他指出，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經濟改革才重獲生機。鄭彪提出一系列理論和實踐的變化，這裏只能簡單地摘錄一些項目。

理論上的新變化：

一、安德羅波夫的「起點論」。赫魯雪夫在蘇共廿二大提出「二十年進入共產主義」。布里茲涅夫把它拋棄，另提蘇聯已進入「發達社會主義的成熟階段」。安德羅波夫在布里茲涅夫去世前夕提出蘇聯「正處於發達社會主義漫長歷史階段的起點」，一九八三年二月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發表文章中重申。

二、認為「蘇聯社會的生產關係嚴重地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

三、經濟體制落後於科技革命，應建立經濟機制的新模式。

四、不能以公有化程度來作為判斷所有制先進與否的標誌；集體所有制不是過時的經濟形式，不能急於「過渡」；放鬆對個體勞動的限制，允許私人經營；在國家所有制方面，強調應將占有方式同經營方式區別開來。

實踐中的經濟試驗：

註① 中央日報（臺北），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卅日，第五版。

一、擴大企業自主權。包括計畫審批權、生產經營權等。

二、改進計畫工作。

三、提高經濟槓桿和物質刺激的作用。

四、改組國民經濟各級的組織管理機構。^②

安德羅波夫雖銳意改革，但因體弱多病，在病榻的時間長於在辦公室的時間，以致成效不著。契爾年科主政的十三個月，更少成就。戈巴契夫參與甚至是影響了這兩任總書記的改革，但無疑要到他自已接任總書記時，才能展其「鴻圖」。

叁

一九八六年三月的蘇共第廿七次大會，是戈巴契夫上臺後的首次代表大會，那次大會確定了加速經濟發展戰略。同年開始的蘇聯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就是這項戰略的決定性階段。這個五年計畫是同年六月十九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十一屆五次會議通過的。會議前夕蘇共召開中央全會，戈巴契夫在會中指出，新五年計畫的主要任務是，在加速科技進步的基礎上提高經濟效益。「改變結構政策和投資政策，以利於社會生產集約化」。這些都反映在第十二個五年計畫中，其要點為：

一、轉向集約化發展。蘇聯領導人把第十二個五年計畫稱作國民經濟由粗放發展向集約過渡的「轉折性計畫」。其主要標誌為特別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和節約資源。計畫規定今後五年國民收入、工業產值和其他物質生產部門產值的增長額幾乎全部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得。

二、加速科學技術進步。進入七十年代後，蘇聯科技發展緩慢，在電子、電子計算機和自動化機械等方面明顯落後。專家估計，蘇聯在工業技術應用方面落後於美國十二至二十年，在電子技術、石油化工、儀表與自動化工具等部門落後十至十五年。因此認定加快科技進步是提高國民經濟效率的「重要槓桿」，是實現生產集約化的「主要手段」。加速科技進步的戰略是：集中資金解決國民經濟的關鍵性問題，普遍推廣經過實踐檢驗的新技術和研製能使勞動生產率成倍提高的嶄新的技術設備和工藝。

三、調整結構政策與投資政策。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N. I. Ryzhkov)說：「改變的實質在於將注意的中心從數量指標轉移到質量與效益上來，從中間成果轉移到最終成果，從擴大生產基金轉移到更新生產基金，從增加燃料和原料資源轉移到改進其利用。」至於調整投資政策的要點為：增加國民收入中積累的比重；把重心從新建和擴建轉向對現有企業的技术改裝和改

註② 鄭彤，「蘇聯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發展及其前景」，社會科學學報（吉林大學）第二期，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三五—三七頁。

造；克服基建資本分散的現象，使投資周期至少縮短一半。

四、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根據廿七大確定的方針，改革的中心內容是既要提高集中領導經濟的效率，又要擴大聯合公司和企業的自主權，提高它們對自己工作成果的責任心，並完善管理體制，包括合併同類部門、取消中間環節和解除條塊分割的矛盾。

由上引瞭望周刊的資料看來，蘇聯的改革不僅需要，其方向也是正確的。此外，改革有計畫按步驟進行，而戈巴契夫更是膽大心細。一九八七年二月廿四日，他對一位西歐領導人說，蘇聯「將堅定不移地，但也要小心謹慎地前進，以便保持船不搖晃，使任何一個船員和乘客都不會暈船。」^④

關於蘇聯經濟改革的內容，本刊已多有分析報導，茲不贅述。這裏僅指出，蘇聯於一九八四年開始改革經營管理方式和加強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工作，一九八五年擴及到七〇〇項企業，一九八七年要擴大到全部工業及運輸產業部門。同年春實施個體勞動法。一九八八年一月起佔工業總產值六〇％的企業按國營企業法規定轉入自負盈虧、自籌資金和自治的軌道，一九八九年將推廣到所有企業。又一九八八年五月第十一屆蘇維埃第九會期通過的合作法，於同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如此有計畫逐步實施改革，可看作是其穩健精細的一面。但戈巴契夫的改革，不僅涉及原有的經濟體制，也觸及到政治體制和上層建築。他經常的用語是「PERESTROIKA」，可譯為重建或改造，「GLASNOST」，可譯作公開性或開放性（Openness）。此外，更有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加速（Acceleration）、新思維（New Thinking）等等，這就是大膽的一面」。

戈巴契夫要求報紙新聞報導真實，開放言論尺度，若干書籍解禁，不少政治犯被釋放，像布哈林（N. I. Bukharin）等三十年代被整肅的分子，也陸續恢復了名譽。這表示戈巴契夫了解到不配合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是難以收效的。可是，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否「三年有成」了呢？顯然沒有。一九八七年蘇聯經濟的主要指標，都未能按計畫完成。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六日，蘇聯科學院的雷賓在勞動報上發表的統計顯示，一九八六年蘇聯有三五％的國民月收入在一〇〇盧布以下，此一低收入階層中的四〇％，家有未成年兒童，三〇％其兒童不只一人。一五％的家庭只有單親，另一五％靠養老金過活。他呼籲說：「貧困仍然是（蘇聯的）緊急問題」。^⑤

理想和現實竟有如此的差距，也許是戈巴契夫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主要原因。

註③ 王憲學、楊福田，「蘇「加速戰略」的新五年計劃」，瞭望周刊（中共），第廿七期，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二五—二六頁。

註④ 于虛，「蘇聯改革的新發展」（下），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二版。

註⑤ 轉自庶經新聞（日本），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

肆

從歷史上看，蘇共的黨代表會議都有其重要意義。

蘇共黨章規定，每五年舉行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一次。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如有必要，可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從一九〇五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三十六年間，蘇共（及其前身）共召開過十八次全國代表會議，每次都決定了重大的問題，有其重要的意義。效舉其要者如左：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是爲了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在舉行武裝起義的緊急時刻召開的。

一九〇八年的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列寧及其支持者擊敗孟什維克，取得了勝利。

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驅逐了孟什維克「取消派」，恢復了一些被其撤廢的黨中央機構，選出以列寧爲首的由七人組成的黨中央，是列寧的又一次勝利。

一九一七年四月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通過列寧的「四月提綱」，目的在打倒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

一九二五年四月第十四次全國代表會議，採擇了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認爲社會主義可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史達林撰寫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改變了以往不斷革命的說法，強調蘇聯有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一國社會主義論」的通過，象徵著史達林的勝利）。

一九四一年二月第十六次全國代表會議，討論了動員社會主義經濟潛力，進一步加強工業和運輸業的問題，以適應鞏固國防的迫切要求。那是德蘇戰爭前夕，整備國防體制的一次會議。^⑥

第十八次全國代表會議後，歷經了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四任第一書記、總書記，時間經過了四十七年，才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至七月一日舉行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其重要性可知，也因此引起世人注目。

第十九次黨代會的召開，是一九八七年六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的。一九八八年五月蘇共中央全會討論通過了第十九次全蘇黨代會的提綱。全會認爲爲保證社會經濟和其他領域的改革能順利進行，「必須改革蘇聯社會的政治體制」，這項改革的目的是：「使廣大勞動人民羣衆現實地參加對一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完成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建立。」

註⑥ 參見：(一)「蘇共全國代表會議」，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第七版；(二)「蘇聯黨大會、代表會議年表」，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第六面。

「塔斯社」發表的五月全會決定供第十九次黨代會討論的政治體制改革提綱要點為：(一)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二)黨政職能分開；(三)改革選舉制度，實行差額選舉；(四)改革幹部政策，加強監督和檢查；(五)恢復蘇維埃的權力和作用，擴大蘇維埃活動的開放性；(六)實行重大的法律改革。⑦這些都在代表會議中提出且照單通過，令人意外的是戈氏在會議開幕演說中，突然提出設置一個權力幾乎與總統制下的總統相埒的國家主席。會議通過的六項決議是：(一)關於第廿七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實施經過及深化改造課題的決議；(二)關於蘇維埃社會的民主化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決議；(三)關於同官僚主義進行鬥爭的決議；(四)關於各民族間相互關係的決議；(五)關於公開化(GLASNOST)的決議；(六)關於法律改革的決議。⑧這次會議的核心！就是戈巴契夫自己提出的，以最高蘇維埃的徹底改編和任期制為兩大支柱的政治體制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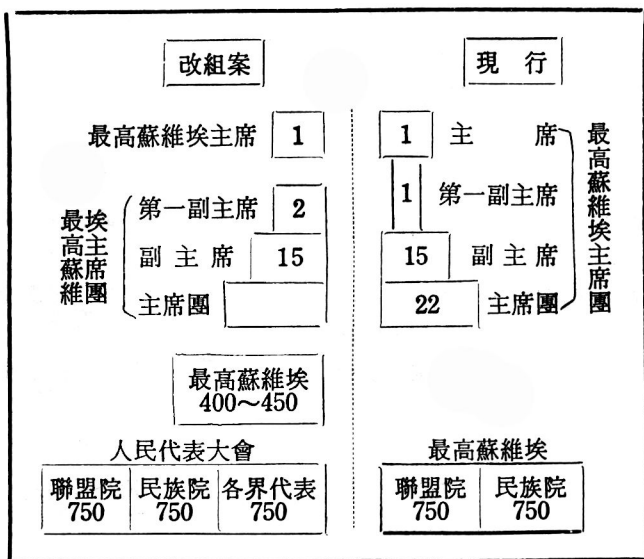
伍

現行的蘇聯最高蘇維埃，由聯盟院(七五〇席)和民族院(七五〇席)代表共一、五〇〇人組成，每年兩次會期，每一會期通常是三天。因此另設三十九人構成的主席團，為常設代行機構，主席團主席即國家元首。

戈巴契夫提出的改革案，於原有兩院的一、五〇〇名代表之外，另由黨、工會、合作社、青年、婦女、科學家、藝術家等組織選出各界代表七五〇人，連前合共二、二五〇人，組成「人民代表大會」，每年會期一次。大會選出四〇〇至四五〇人構成的最高蘇維埃並選舉最高蘇維埃主席。

新的主席是具有實權的，他對立法及重要社會經濟綱領之準備進行指導，決定外交政策、國防、有關安全保障的重要問題，領導國防會議(現由黨總書記任主席)並推薦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新的主席是

附圖一 最高蘇維埃改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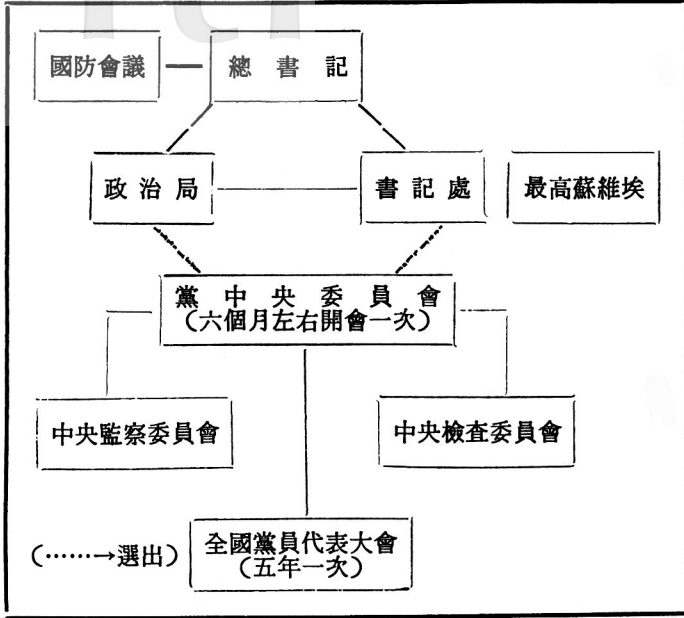
註(1) 阿拉伯數字為人數。

(2) 資料來源：產經新聞夕刊(日本)，1988年7月2日，第三面。

註⑦ 詳請參閱「蘇政制改革提綱內容簡介」，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六月八日，第三版。
註⑧ 轉自產經新聞夕刊，一九八八年七月二日，第一面。

否由總書記兼任，雖尚不夠明朗，但一般相信這個類似總統的主席職位，現階段自非戈巴契夫莫屬。(附列各圖請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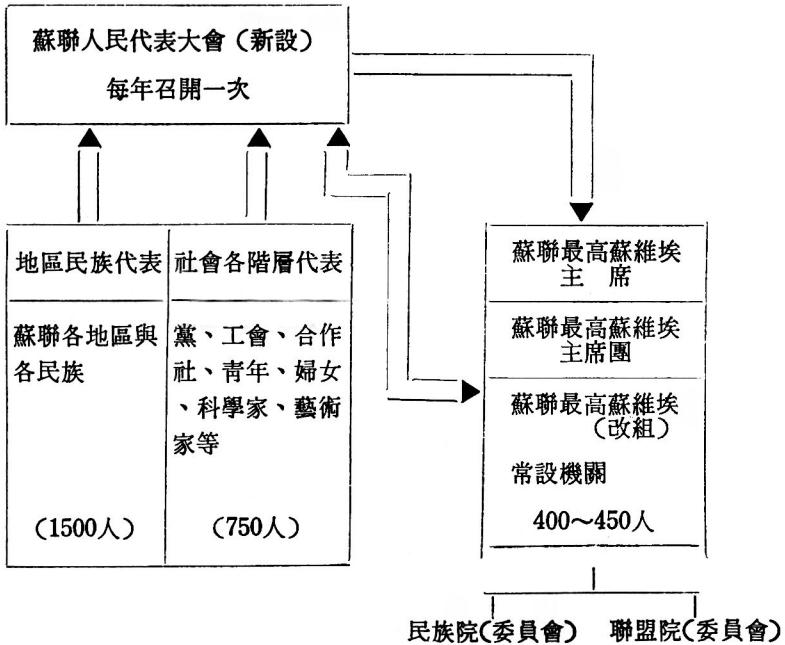
附圖二 蘇聯現行中央機構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第七面。

從地方到中央的黨幹部和國家、政府幹部任期五年，只許兩任，原提議例外的第三任在會中被剔除。會後兩月內，地方黨部開始選舉，採複數候選人及秘密投票制，年內完成。又中央和地方黨機關，為與中央、地方蘇維埃分擔權力，將採行新組織。惟地方黨部第一書記兼地方蘇維埃主席，則權力分離之實質不能令人無疑。

戈巴契夫提議的蘇聯國家新組織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日本），1988年6月9日，第六面。

共產集團改革幹部人事制度並實行黨政分開，正在逐漸普遍化中，但歷史上尚無成功先例。

一九六一年十月赫魯曉夫主持蘇共第廿二次大會，通過蘇共第三個綱領並修改黨章，規定蘇維埃選舉時，改選代表不得少於蘇維埃代表總數三分之一，代表以三任為限。黨領導機構每屆選舉，幹部至少更換三分之一，任期也不得超過三任。惟顧及領導的連續性，如經大會代表四分之三通過，也可繼續連任。赫魯雪夫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下臺，這些規定就被布里茲涅夫擱置。越共最近規定總書記任期不得超過十年，但尚未到期。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制定新憲法，限制公職的連任、重任。一九六六年十月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SKJ）大幅度改組黨機構，實驗將黨與政府分開。依狄托（Josip B. Tito）的構想，黨以擔任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教育）為主，不介入從地方自治體到聯邦政府的日常工作。因而除狄托本人外，所有黨幹部均脫離政府官職，而且決定日後選舉可不經黨提名而自由競選。當時並曾廢止黨中央的書記處。一九六九年三月南共聯盟第九次大會修改黨章，廢除了中央委員會。但一九七四年五月南共聯盟第十次大會時，又強調「基於民主集中制原則，維持對國政各個領域之強有力的指導是必要的」。乃將上次大會廢除的中央委員會再予恢復，並設中委會執行委員十二人為指導機關。一九八七年六月南共聯盟第十一次大會，又廢中委會執行委員，另以中委會主席團為最高執行機關，復設中委會主席團書記一人，由主席團委員杜蘭柯（Stane Dolanc）擔任。南共聯盟不能捨棄民主集中制，不能放棄黨對政府的領導。其黨政機構與相互關係，不斷改組與摸索，其官僚主義也依然故我。

共黨國家的官僚主義，乃是制度的產物。因為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由政府包下來，國家、人民的事務無所不管，權力無所不在，於是官多、權重，是事實所需要，官僚主義也就應運而生，那不是黨政分開等所能消滅的。而且，馬列主義那種反傳統的革命、建設，自然需要黨的強有力領導。既然如此，黨政分開也就不容易做到。

幹部任期制雖然意在防止個人崇拜與鐵飯碗現象，可是如前所述，迄今還沒有實行而成功的先例。以蘇聯而論，代表會議通過的改革案，大概要在今年秋現行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通過並對憲法作部分修正後才能實行，新的「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會期當在明（一九八九）年四月，屆時戈巴契夫將成為新的具有實權的國家主席，但他的任期也限於兩任。那麼，從一九八五年三月他就任黨的總書記算起，到一九九九年他第二任國家主席任期終了（假定他不中途失足），前後不過十四年，我們很難相信他的改革已徹底成功，蘇聯政治、經濟已步入坦途。萬一他的改革尚未竟全功，而任期已盡，他的年齡還不過六十六、七歲，他是否肯就此罷手？不能令人無疑。

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有些新氣象，代表的選出未盡符合改革派的原意。已被趕出黨的政治局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前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葉爾岑(B. N. Yeltsin)又當選代表。會中發言相當大膽，連戈巴契夫也受到批評。但是，戈巴契夫演說中提到人權問題時，強調以列寧的原則為基礎。提到黨的改革時，更強調蘇聯共產黨的路線，先透過在國家權力機關和社會生活全領域中活動的黨員，完全恢復列寧的原則。強化蘇維埃的權力，也符合列寧的構想。而當他談到共和國國境和反對黨問題時，則聲言不容許利用民主的權利達到反民主的目的。他聲稱社會主義的選擇是正確的，一切行動只能在社會主義範圍內，並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⑨。這可顯示出他的民主化的限制。

代表會議期間會利用傳播媒體報導會議實況，那和會後為受史達林大整肅迫害者立紀念碑的作用相同，目的在震懾反對的保守派。會議期中更有人公開抨擊葛羅米柯(A. A. Gromyko)和李加契夫(Ye. K. Ligachev)等保守派。迫使李加契夫不得不在會場表明，一九八五年三月是葛羅米柯(現政治局委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索羅敏澤夫(M. S. Solomentev)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契布里可夫(V. M. Chebrikov)政治局委員、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主席)和他本人(李加契夫)支持戈巴契夫上臺的。事實上，這些保守派並不可怕，改革的真正阻撓者，乃是戈巴契夫所謂一、八〇〇萬管理人員，其中二五〇萬是聯盟、共和國、地方、州的管理人員，其餘為企業管理人員。經濟改革剝奪了他們經濟上的既得利益，政治改革他們也是受害者，裁員使他們立即失業，任期制使他們的鐵飯碗搖搖欲墜，他們怎肯認真執行改革？可是，失掉他們的支持，改革也就難以貫徹。

戈巴契夫開幕演說，也提到國際關係。他說蘇聯的改造、重建，具有世界性意義。改造對國內的基本變化和國際問題的新態都是必要的。以新的政治思維為基礎的對外政策，使戰爭威脅的祛除成為可能。如果此一傾向繼續加強，在進入廿一世紀的轉型期，世界就可慢慢具有非軍事化和國際關係人性化的特徵。今後我們的對外政策，仍將以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為第一優先。我們將不斷追求與發展中國家及不結盟運動組織繼續深化關係的政策。在裁軍問題上要同有關國家的權力階層積極地進行對話與交涉。^⑩由於去年底蘇聯與美國簽署廢除中程核武(INF)條約，戈巴契夫與雷根總統舉行第四次高峯會議，今(一九八八年)又從阿富汗撤軍，使得戈巴契夫在國際間獲得很好的評價，於是自由世界對蘇聯國內的改革也就寄予不低的期許。對此，筆者想引用對蘇聯事務頗具經驗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話作為參考。他說^⑪：

註⑨ 戈巴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中的開幕演說，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八年六月廿九日，第六面。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尼克森，一九九九：不戰而勝(1999: Victory Without War)，一九八八年四月由Simon & Schuster書局出版。轉自讀者文摘一九八八年七月號，二二頁。

「戈巴契夫不是秘密的民主分子，而是赤誠的共產黨員。他不是要減少蘇聯的共產主義色彩，而是要提高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效率。西方許多捧戈巴契夫的人都忽略了一個冷酷的事實——更強大的蘇聯不會是美國的盟友，而是更危險的敵人。」
但不論戈巴契夫「改造」的前途如何，它必然像一股旋風，會影響到共黨集團甚至整個世界。（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廿五日脫稿）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

本書由日本外國語大學教授宇佐美滋及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兼「美國月刊」主編蘇 起著，宇氏日文原稿，經政治大學東語系教授王兆徽先生譯成中文；被訪問的美國決策人物包括：卡特總統，卡特任內的國家安全會議助理奧森伯格及亞太助理國務卿赫爾布魯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伍考克、前駐華大使安克志，尼克森時期的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羅德與亞太副助理國務卿格林，以及雷根政府的前亞太助理國務卿何志立等八人。

全書約十一萬字，十六開本平裝，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國內郵購加郵掛費二二元）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 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電話：九三九四九二一轉二二六 地址：臺北市木柵萬壽路六四號